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三重逻辑^{*}

韩艳红

【内容提要】 准确判断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事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和工作顺利开展的重大政治判断，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理论贡献。基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文章深入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一般规律，梳理总结其历史逻辑，分析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源泉，系统研究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遵循和分析方法。以史为鉴、以史明志，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国情，是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要矛盾 以人民为中心

作者简介：韩艳红（1980-），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吉林长春 130117）。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是我们党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运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分析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全面梳理和总结历史经验，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既有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提到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要求，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理论智慧。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

我们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是产生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对于深刻理解社会矛盾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脉络，掌握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之际，自成立之日起便肩负起改变社会面貌和性质的重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以史为镜、以史明志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求是》2021年第12期。

并不断探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寻找应对和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出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说明党在建立伊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但从理论认知的内在逻辑来看,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研判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的。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①,等等。党的二大提高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为后来党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基础。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巧取豪夺,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提出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主张。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党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形势,指出中日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6月到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重新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客观分析国民党在军事装备和经济力量上的优势,以及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的弱点,在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重申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团结依靠人民,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获得了巩固和发展,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准确研判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革命和建设方向,制定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是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剿匪、镇反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段时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②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该决议指出,“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③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变化,以及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动摇了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8年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0-341页。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①判断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偏差，导致我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过程。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

在不断探索中，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国情，拨乱反正，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的认识和把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矛盾“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9年3月，我们党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③这标志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④以此为基础，党明确了对社会发展动力和中心任务的认识，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认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并把它载入党章总纲。1987年10月至11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明确的阶段划分，并提出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⑤，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把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并与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起载入党章，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⑥。之后，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长期不变的论断，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和认识更加成熟，指出“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强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⑦。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坚持和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基本上沿用了上述提法。

4. 新时代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⑧，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⑦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飞跃。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愈发强烈向往温饱之上的美好生活，党精准研判、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2012年11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思想。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和新需要，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2014年12月，党中央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②。2017年10月，我们党在十九大报告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这一符合实际、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判断，是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认识上的重大创新，集中回应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正确指引我国的发展方向，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是我们新时代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贯穿于历史逻辑之中，既指导着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发展，又在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就是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

1.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根据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社会基本矛盾，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把握社会矛盾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准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和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梯叶里和亚当·斯密等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形成了唯物辩证的矛盾观和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肯定了他的“矛盾动力论”，同时批判了其客观唯心主义，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88、792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①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异化劳动来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矛盾，总结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

列宁在对俄国社会革命和实践的探索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基本矛盾思想。根据俄国复杂的国内形势，列宁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通过发展生产力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一，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和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了“两个归结”的经典判断：“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③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找出决定社会思想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根据生产关系的类型划分社会形态，在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通过“两个归结”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列宁明确使用了“基本矛盾”这一范畴，指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④。同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阐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金融垄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矛盾也极端尖锐化。”资本家和工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不可调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⑤，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制度，这就赋予了社会基本矛盾思想以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

第二，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探索。1920 年，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混淆“对抗”和“矛盾”两个概念时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⑥ 列宁认为，矛盾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中，有利益冲突的阶级社会存在对抗，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根据俄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情，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⑦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矛盾。在推进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9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37 页。

⑤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19、122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6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81-282 页。

⑦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90 页。

“人民内部不一致”的重要论断，这种不一致体现在工人和工人、农民和工人、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各民族之间，不同的矛盾和利益诉求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一论断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2.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发展：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深入研究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问题，揭示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是党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理论来源。

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矛盾原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和“主要矛盾”原理。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存在各种矛盾，矛盾是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在各种矛盾中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才能得到解决，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准确判断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和方向。“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 这些思想是指导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此外，毛泽东创造性地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否认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是相适应的，但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并且这个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等的社会矛盾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解决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解决矛盾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毛泽东还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专政……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③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④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变化，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党正确认识和及时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3.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了党的八大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深入探究社会基本矛盾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进行经济建设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并从我国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2、32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214、213-21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20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情出发，认为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完善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就要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②改革也是革命，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矛盾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途径，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拓展和完善了矛盾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把握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却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难题需要解决和克服，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之间的矛盾，经济快速发展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收入差距拉大同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这些深层次问题。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③。发展先进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设先进文化，运用先进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在各个方面相互协调发展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经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实践呼唤和孕育着新的发展理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④。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处理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发展，为正确处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各种非主要矛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4.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为依据，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判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同时又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矛盾是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6、272页。

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65页。

哲学范畴，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矛盾分析法要求从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完整认识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要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国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发展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互掣肘，是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的主要根源，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影响着社会全局的发展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①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把“变”与“不变”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的国际地位这个最大的实际，在“不变”中探寻社会供给和需求的阶段性特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述是理论与实际的重要连接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飞跃的思想基石。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

1.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保障：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就在于面临各种环境和问题时不断进行自身建设，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党的建设是实现对各个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科学认识和妥善解决的重要保障。

在我们党成立初期，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和组织上的自由散漫性严重影响党的队伍。在党的建设道路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要求所有党员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员的行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选拔党的干部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③党的政治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我们党逐渐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范围的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提出制度建党，运用制度来规范党的活动，约束违背党的利益的行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④。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党来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变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主线，将从从严治党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开启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①。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从从严治党融入治国理政，这是我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也是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

2.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原则：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研判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充分说明，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中获得利益与实惠，这既是党的宗旨和性质的基本要求，也深刻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

党在领导人民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时，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基本原则；在制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以满足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追求；在考察社会主要矛盾是否顺利解决时，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的价值诉求作为根本评价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的和归宿，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③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种难题中精准研判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诉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④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要求“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要求“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⑥。这些论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在教育、就业、精准扶贫、社会保障等方面不断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实践中，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94-1095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④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15期。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始终坚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源源不断地获得认识、把握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力量。

3. 党百年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依据：立足于国情

了解国情是认识和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准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此制定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对国情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使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符合现实国情。在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党以国情为基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规律，制定出解决各个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可行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党根据具体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及其阶段性特征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带领人民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的国情出发，坚定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审视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的具体实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各种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全面深化改革增添发展动力，以高压反腐净化政治生态，以脱贫攻坚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2] 谢伏瞻：《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引领时代前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3] 王立胜：《重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新中国70年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8期。

[4]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5] 卫兴华：《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6] 刘须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7] 艾四林、康沛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8] 赵中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与形态特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编辑：刘曙辉）